

怎么看中国近代思想进步史——请教方朝晖教授

作者：王也扬 文章来源：2010年4月28日《中华读书报》 点击数： 更新

拜读了方朝晖教授的大作《怎么看“尊王”、“忠君”、和“三纲”——读刘泽华、张分田“国学”月10日），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怎么看中国近代的思想进步历程了。所以有进一步请教方教授之必要。

方教授由衷赞美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君主制，说它是“在当时条件下”，“促进绩效制度”。由于有“在当时条件下”的话，方教授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妥，可是“当时条件”的时段究竟教授没有明说。从他后文闪烁其词的表露，如“遗憾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对西方价值观的崇拜导致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即“尊王”、“忠君”和“三纲”等——引者注），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我们不断前政治为特色的民主政治，并不符合以集体主义、关系本位为特点的中国文化，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仍将是才可以明确地知道，方教授所谓的“条件”，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这问题就大了。

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这是时下学校历史教学的标准答案。反封建，就包括反对君主方教授把君主制说得那么好，还反它做什么呢？借方教授的话说，“只能认为我们的祖先是傻子了”。烈

几乎无人不晓，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是在落后、挨打的痛苦、屈辱中起步的。当列强侵略，国人祇才一步步艰难地认识到自己整整落后于西方社会一个历史时代。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说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是我们所不及，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全部解放的运动。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了一个新时期来了。梁启超说的“新时期”，即五四运动。此（科学）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认识、接受。如梁所言，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梁启超在这里说得斩钉截铁，因有其亲身经历的事实为根据。1915年，袁请的外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长文，鼓吹“君主制更适合于中国国情”。杨度等一批文人组织大唱赞歌。对此丑行，梁启超拍案而起，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予以揭露，继之又拒袁世凯重金收险从天津潜往他的学生蔡锷领兵驻扎地云南，发动了讨袁护国战争。结果全国纷纷响应，袁世凯只做了几《异》文中驳斥杨度、古德诺等人说：“谓共和必召乱，而君主即足以致治，天下宁有此论理？”我国王总统之事，而丧乱惨酷上百年，又如何解释呢？相比杨度等国内文人的投机心态，古德诺还多少有一点声明，表示自己并不同意中国国内学者关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的简单论断，强调一切应以“条件”为转移制是最佳的政府形式……反之，在与美、法有着不同国情的国家，君主制经常是更为合适的。”古氏的辨界讨伐之声不绝，《甲寅》杂志批评道：“不惜颠倒万世之是非，鼓簧天下之耳目”；“丧独立之良德，

方教授反复批评“要么民主，要么专制”的二分式思维，说要“认识到人类政治制度的多样性”，但不是专制制度。如果他认为那不是专制制度，得用证据说话，而不能用这种含糊其词的方式说话。稍稍了多年，君主专制为虐神州，至明代达于造极。暴君、昏君行残酷统治，武力争天下血雨腥风，外戚、宦官性动荡，反复破坏，发展停滞。早在西方近代学说传入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步思想就对君主专制迫害是变“公天下”为“私天下”。方教授称颂明代名相方孝儒不惜以身死维护王位继承制，殊不知方氏是孟子贵民之教。他认为“天之立君所以为民”，“后世人君知民之职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职在乎养民，不修。”他甚至说“斯民至于秦而后兴乱。后世亡人之国者大率皆民也”，对人民的反暴君斗争给以一定宗彘、顾炎武等人，反对君主专制的论说就更加鲜明。他们抨击秦以后的帝王皆是“视天下为己有”的暴之骨髓”，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并且坚决否定“君为臣纲”，宣称“我之出仕也，为天下及至西方近代学说传入，中国进步思想界终于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积弱积贫的根本弊端在于君主专制制度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要救国必须彻底根除“奴隶根性”。梁启超说：“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谭嗣同说，制度，皆依此为率。”名教既立，虽身受荼毒，亦俯首帖耳，无敢呻吟，致人伦失其平等，社会趋于腐败名教不可。他提出要使国民精神“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可以说，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如方教授所言，是什么“民主、专制”二分式思维的产物，而是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苦苦求索、觉醒觉悟今天的现代化社会转型事业。记得30年前，正是黎澍等一批史学家以批判君主专制主义的檄文，反思历史的序幕。我们现在提倡继承传统文化也好，振兴国学也罢，总不能精华与糟粕混淆，黑白与是非颠倒吧？

方教授说：“民主政治只不过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制度安排，而不是可以超越具体的历史文里连用两个“特定”，意在强调民主政治在人类历史中根本就没有普遍性。和前面关于君主制的说法一样境”，其时空同样延至当今世界。这种观点，出于一位经常到国外讲学、见多识广的学者之口，着实令人生于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但是，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否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主同自由、际大家庭所普遍接受，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理念。早在1916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昌，逆之则亡”的著名题词。6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是高唱着“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之歌建立新中个成员国（我国既是发起国，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成员国一致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以及对《权宣言》明确认定：“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这内的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同意，怎么能说没有普遍性呢？需要指出，在当代，民主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

文化的概念来偷换基本人权的概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错误的。方教授还说，“二战以来实现民主化的拉丁美洲，迄今为止真正成功的还为数甚少。”这是事实吗？所谓从东亚到南亚，不知是指日本、韩国，主政治是否成功，应该由当地人民说了算数，别人给他们下结论似乎武断了一点。至于方教授把“君要臣不得不亡”拉在一起说事，抹杀前者是人治后者是法治的根本区别，就显得很欠专业了，如果拿这种东西

方教授在对君主制和民主政治作了一番褒贬之后，亮出了自己的主张：推崇“儒家式的贤能政治”作“基石”。这肯定会吊起他的学生们求知的欲望，遗憾的是，方教授就此打住了，没有做深入、展开的说明。“贤能政治”要不要权力制约？要不要法治？要不要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如果要的话，它与民主政治有何区别？韩昌黎曰：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还请方教授指教。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

- 上一篇文章： 走出历史迷雾，重铸中国文化价值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发表评论】](#) [【加入收藏】](#)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 又
- 评